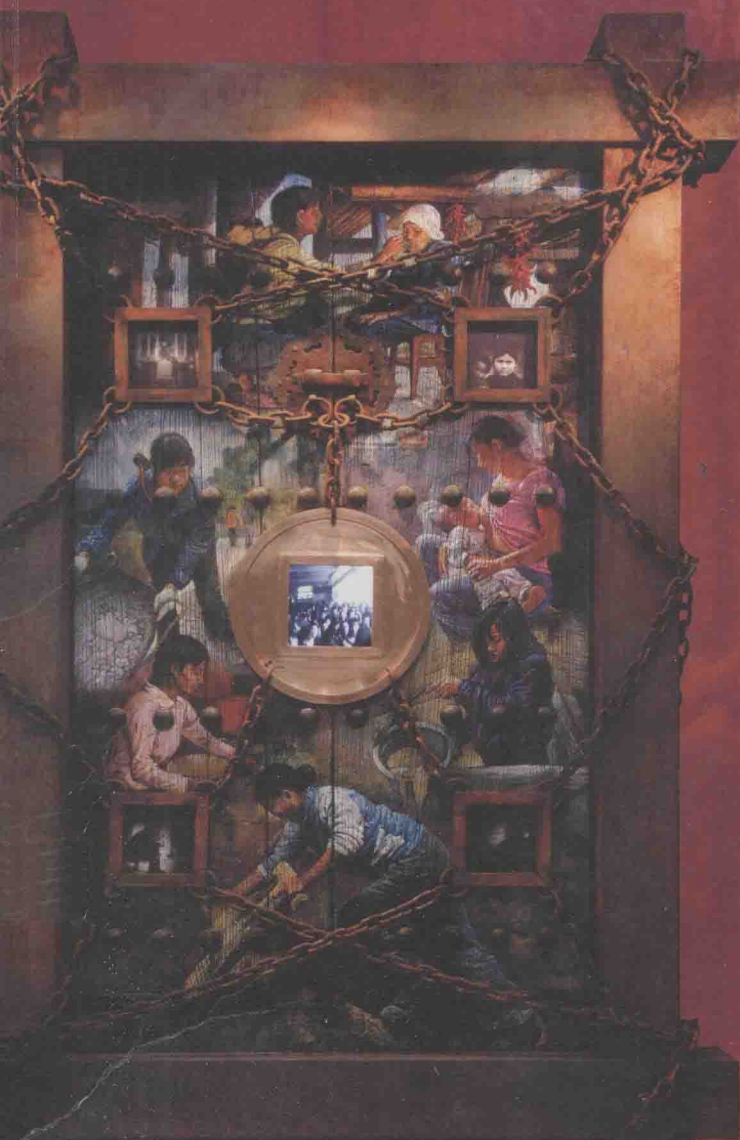


双重强制

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

DOUBLE COERCION
GENDER EXCLUSION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LEFT-BEHIND
POPULATION

叶敬忠 潘璐 贺聪志 著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双重强制

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

叶敬忠 潘璐 贺聪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叶敬忠，潘璐，
贺聪志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 - 7 - 5097 - 6483 - 1

I. ①双… II. ①叶… ②潘… ③贺… III. ①农村 - 人口
流动 - 妇女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505 号

双重强制



——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

著 者 / 叶敬忠 潘璐 贺聪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韩莹莹

责任编辑 /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23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483 - 1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参与撰写人员

叶敬忠	潘璐	贺聪志	吴惠芳
汪淳玉	张克云	刘娟	屠晶
张瑾	徐思远	王维	郁世平

前 言

近 2 亿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已成为共识。由此引发的近 2 亿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也已成为学界、社会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自 21 世纪初就一直坚持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社会讨论，并努力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首先是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从农村留守儿童，到农村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再到农村非留守群体以及留守社区；其次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和深化，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的影响，到社会支持与留守人口的能动性、留守人口的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再到中国发展路径和模式的批判性研究。之所以有这些研究方面的变化，既是因为研究者通过不断学习与积累而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的认识有所加深，也是缘于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现象本身的变化。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专著，就是上述研究变化的体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其

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别国未有；其影响之深，难以想象，出乎想象。由此带来的整体社会结构和乡村共同体之大变局，是任何理论家，尤其是善于坐而论道的理论家，所难以解释清楚的。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研究者只有抛弃预言家和冥想家的幻想与自负，放下身段，起而行之，到乡村变局中去学习、认识和思考。例如，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开始阶段，外出者大多为家计所迫，赚钱是其唯一目的，且大多为男性。现如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人的成年礼和通过仪式；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主流文化；“城乡两栖”的打工生活已经成为农村青壮年的主流生活方式；大量女性外出务工；在很多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轻未婚女性；凡留守乡村者，都有一个特殊的未外出之原因。这些乡村巨变，既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机会，也对现实的学术解释提出了挑战，更为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和乡村生活方式的销蚀增添了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为主旋律，并通过 30 余年的话语体制，将之变成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时至今日，“发展”已经变成真正的“硬道理”，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只要一踏入今日之乡村，我们会深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乡村躁动和乡村人口创业赚钱的狂热。这样的“发展”已经演变成“发展主义”，它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坚信应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实现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此时，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不断地市场

化和商品化，农村人口无时不感受到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力。无论是农村的男性，还是女性，均逃脱不了这一巨大压力。因此，他们必须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外出流动，而有人需要留守。在这一流动与留守的决策与安排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长期存在无须言说的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的约束，而这些又是加在农村女性头上的有声强制力。因此，若从性别敏感的视角来观视流动与留守背景下的农村人口，我们可以发现，与农村男性相比，女性承受着双重强制力量的挤压，一是针对所有农村人口的强制商品化的无声压力，一是专门针对农村女性的性别排斥的有声压力。这双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设计并开展了性别维度的流动与留守研究，目的是对劳动力流动与人口留守社会代价的性别分配进行分析，以揭示流动与留守过程中的性别排斥与性别不平等。我们组成了由 19 名研究人员参加的“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研究”课题组，遵循团队研究的传统，多次组织团队研讨，充分准备设计，并于 2013 年 1 月在河南省固始县的 6 个村庄和新县的 4 个村庄开展实地调研。我们主要采用了质性研究的访谈法，并辅以问卷调查法。深度案例访谈对象包括留守妇女、留守丈夫、留守老人、非留守女性、返乡女性、村干部、县乡干部及妇联系统负责人等，小组访谈对象包括留守妇女、留守丈夫、留守老人、非留守女性，问卷调查对象为留守妇女和留守丈夫。实地调研获得了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和数据。

本书所呈现的是该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七个部分：第一

章为研究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相关文献和研究设计；第二章是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留守社区的整体图景；第三章是性别特异的留守生活与生命体验，尤其关注的是留守女性和留守丈夫；第四章是农村留守女性的能动性行动与策略；第五章对农村社区中的非留守群体进行了分析，揭示了非留守群体与社区整体劳动力流动的联系；第六章展示了农村社会支持的现状，并探讨了农村、农业与农民的未来趋势；第七章在有关留守人口和留守社区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为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乡村的结构变迁做出贡献，并为有关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增添新的学术视角和人文关怀。

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历时近一年半的集体研究成果。“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研究”由叶敬忠教授主持，参加人员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是潘璐、贺聪志、张克云、汪淳玉、吴惠芳、刘娟、李华、冯小、宁夏、付会洋、屠晶、徐思远、张瑾、何明慧、王维、郁世平、胡鹏辉、覃志敏。他们均参与了实地调研和对定性与定量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部分成员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还有幸与世界银行的社会性别专家帕特里夏·费尔南德斯（Patricia Fernandes）女士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王小林研究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我们关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多年来得到很多组织和项目的支持，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德国 EED 基金会、国际计划、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每一次的农村实地调研经历，都会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

记忆；与农村人口的每一次际遇，都会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再思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对于社会研究者来说，不知哪里还有比在中国乡村开展调研更为顺利的？在调研过程中，县、乡、村的干部不分白天黑夜、雪天晴天，带领我们走乡串户、访问农民，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而在任何一个村庄，那些农村人，无论男女老少，或在家操劳或在田间耕耘，或在路上行走或准备歇息，无不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他们放下手中的活，热情地端茶倒水，不厌其烦地与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他们把我们当成可以信任倾诉的人，向我们讲述其农村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其中不乏无尽的隐忍和挣扎、难言的苦涩与无奈。一月的河南农村，风冷雨寒，雪飞路阻，在没有暖气的屋里聊过两三个小时后，浑然不知手脚冻麻，因为一个个苦守乡村的留守故事，让我们忘却了逼人的寒气。故事中，留守者每每遭遇无助而倍感孤苦，又常常强作坚强而撑托着等待亲人归来的家。此时此刻，任何听众都会潸然落泪。

在以城市偏向和乡村攫取为特色的中国繁荣发展背后，是那些外出漂泊的农村人，是这些留下守望的农村人，他们默默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这些代价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恰恰相反，发展话语，正在以迅猛之势，不断制造出“贱农和离农”的真理体制，进而摧毁农民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传统文化传统，从而为资本和现代技术腾出贪婪的空间。这个时代的乡村，已经不能承受养活乡村人口之重，或是因为整个社会不能承受富有乡村性的生活方式之轻。在将来的某个陌生时代，若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另一半——农村和农民，我们的生活会意味着怎样的现代、怎样的文明呢？没有乡村和乡村文化

的支撑，或只能悬于半空而不得下。而那些留在乡村的人，正是他们的苦守，抗击了现代化之伤，延缓了乡村性之殇。谨以拙作献给他们！

叶敬忠

2014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相关文献	6
三 研究设计	11
第二章 留守社区	18
一 社区概况	18
二 劳动力流动的变迁与社会认知	22
三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区的影响	27
第三章 性别与留守生活	35
一 留守妇女的人口特征	35
二 留守的决策与叙事	41
三 留守妇女与生计	54
四 留守家庭的照料	88
五 留守妇女的家庭代际关系	103
六 留守妇女的婚姻与情感	113
七 留守妇女的健康与心理	123
八 留守丈夫	136

第四章 劳动力流动与女性能动性	148
一 家庭决策与性别关系	148
二 谈判与抗争	161
三 流动经历的影响	170
第五章 劳动力流动与非留守群体	181
一 何以成为非留守群体	182
二 劳动力流动对非留守群体的影响	187
三 非留守群体的“流动”愿望	198
第六章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发展	203
一 留守人口的社会支持	204
二 农业与农村的未来	214
第七章 留守人口与发展反思	223
一 农村人口：“流动-留守”拆分下的生存困境	223
二 留守社区：虚空的村庄共同体	238
三 “中国模式”：乡村攫取与城市偏向	244
附 录	249
参考文献	274

第一章

导 言

一 研究背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资本全球化和发展主义的推动下，中国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力图推进经济增长并融入全球市场。政府从农业入手进行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集体经济，重归小农经济；在城市和加工工业区推行资本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取代原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计划经济（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2）。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被允许流入城市。这种乡城流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高峰，并不断扩大，持续至今。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现代化范式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影响，以及货币化和商品化的挤压，农民千百年来与土地紧密联结的传统生存方式被贬值，并被看成是“贫穷”和“落后”的。农民单靠农业已经无法维持在泛商品化时代里的生存，他们必须寻找更多元的谋生路径。于是，一种鼓励年轻人进城的

“打工文化”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逐渐形成和普及，它迅速将年青一代几乎完全从土地上剥离，纳入全球资本增殖的链条中。据悉，2012 年中国农民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农民工总量达 2.63 亿人，比上年增加 983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3 亿人^①。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 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 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而占总人口不足一半的农业人口中，只有 40% 的人完全从事农业劳动^②。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正是凭借这些“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 GDP “奇迹”。

然而，中国农民的“去农业化”过程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经历过的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一些学者将之定义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化”（孟庆峰，2011；刘建洲，2012）。一方面，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尽管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有所削弱，使得乡城迁移者实现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但是依然阻碍着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陈映芳，2005；孙立平，2003；赵晔琴，2007）。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农民”身份，仍然具有先赋的制度意义。在“农民工”这个具有二重性意义概念（既象征职业的非农化，又象征身份的农业化）的覆盖下，脱离了农村而试图在城市拓展生存和生活空间的乡城迁移者被建构为与“农民”和“市民”并列的一

① 参见《中国农民工去年月收入增长逾一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3/01/c_114857083.htm，2013 年 3 月 1 日。

② 参见《城市化：任重而道远》，《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82737>，2012 年 11 月 08 日。

个特殊的社会类别（陈映芳，2005）。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这些城市务工人员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结果导致农村外出务工者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权利和保障，多数只能以劳动力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存在，其职业和社会生活状态呈现出鲜明的边缘性、过渡性和变动性（符平，2006；任焰、潘毅，2007）。他们在城市的这种边缘性处境，同时导致了一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沈原，2006）的形成，即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很难实现家庭的整体迁移，只能把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从而造成了一种分离的家庭模式，并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典型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现象。在中国，这些农村留守人口的存在也被戏称为“386199”现象（杜鹃，2004）^①。

可以说，农村劳动力群体在生产领域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以及再生产领域大量分离的家庭和留守群体的存在，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而且，农村不同人口群体并不能同等分享劳动力外出带来的收益，这种社会代价在家庭之间、家庭内部、不同性别间的分配也不平衡。在面对生产性的收入机会和再生产性的家庭责任时，不同性别之间是区别定位的^②。当夫妻不能同时外出时，“男工女守”成为一种典型的“家庭决策”。尽管近年来女性外出的比例正在上升，并且与已

① “386199”：分别以中国的三个法定节日——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6月1日）和老人节（农历九月九日）——来指代三个群体。

② 参见 Shahrā Razavi 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 12 讲上的发言，讲座题目是 *Gender and Agrarian Change-Making Paid and Unpaid Work Visible*，http://cohd.cau.edu.cn/art/2013/4/26/art_8968_71.html。

婚妇女相比，农村未婚年轻女性外出更为自由而普遍，但这些外出的女性很容易因为结婚、生育、家庭照料责任、子女教育的需要而回到农村（虽然可能是暂时性的）。据报道，中国有 8700 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 4700 万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 54.0%（张俊才，2006）。这种家庭决策的形成，不仅涉及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社会服务和支持网络的不完善等，也涉及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如家庭主义、母性主义对家庭成员中不同性别角色和义务的限定。对农村留守妇女（包括有过务工经历的返乡妇女）而言，丈夫外出后，她们需要独自承担照料家庭、养育子女和从事农业生产的责任，在家庭网络核心成员缺位、公共服务匮乏的情况下维持家庭功能的运转，同时还要承受夫妻长期两地分离所带来的情感和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遭遇婚姻危机，从而成为受各种结构性力量压制和影响的边缘性群体。

近年来，面对急剧的经济变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中国政府也在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构国家体系，力图转变 GDP 导向的发展模式，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并开始给予乡城人口流动现象特别关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201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都明确提到这一现象，并致力于转变以往的增长模式，把关注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保障均等化和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和理念，在全社会进行倡导。2013 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报告《2030 年的中国》也强调了中国乡城迁移所引发的焦虑，指出这其中存在着复杂的性别议题，并与人口的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极低的生育率、较长的预期寿命和由于迁移而引发的分离家庭现象。中国政府已

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正着手逐步放开户籍制度，扩大针对农村外来务工者的社会服务范围，与此同时，进一步鼓励和调节劳动力的流动性。除此之外，政府还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来尽可能减少城市地区的社会紧张，处理农村留守人口的社会排斥等关键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益庞大的乡城迁移群体已经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群体流动的原因、对城市产生的影响、在城市的社会适应、身份认同、公民权利等，一直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2005 年以来，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开始逐渐走入媒体、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在媒体报道和文学作品的流行叙事中，这一群体常常被构建为这样一个隐忍而充满创伤体验的形象：长期承受着沉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负担、心理压力和性压抑，缺乏安全感，并且很容易成为性侵犯和丈夫外遇的牺牲品。少数学者也开始改变以往“农民工中心”和“城市中心”的研究取向，转而讨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地区“留守人口”生存状态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的主要基调还停留于对留守人口生存状况的悲情叙事，还只是对劳动力迁移对留守人口影响的朴素描述（叶敬忠，2011）。这些文献至今还甚少为中国以外的研究者所了解。在这些研究中，也有少数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的留守妇女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从性别维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迁移地留守人口影响的研究仍是少数。

本研究以中国农业大学留守人口研究团队的长期研究积累为基础，将视角投射到中国乡城流动过程中受各种结构性力量交叠影响的农村女性留守群体身上，通过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之一的河南省两个县 10 个村庄的实地研究，揭示农村劳动力流动引发的社会代价，及其对不同性别留守人口产生的影响。